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红色延安  
口述·历史  
HONGSE YAN'AN  
KOU SHU · LISHI

#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 台前幕后

下册 回忆录

张军锋 编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出版规划项目



红色延安

口述·历史

HONGSE YAN'AN  
KOU SHU · LISHI

#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

# 台前幕后

下册

回忆录

张军锋 编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SK14N05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全2册/张军锋编.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4. 10

(红色延安口述·历史)

ISBN 978-7-5613-7904-2

I. ①延… II. ①张… III. ①中国共产党—文艺—  
座谈会—史料—1942 IV. ①I2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3187号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上、下册)

张军锋 编

---

责任编辑 赵荣芳 张立  
责任校对 华翔凤 杜莎莎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创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20mm 1/16  
印 张 35.75  
插 页 4  
字 数 434千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7904-2  
定 价 68.00元

---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 CONTENTS

##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台前幕后 下册 回忆录

# 目录

- 001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胡乔木
- 025 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的经历 丁玲
- 047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刘白羽
- 059 记延安文艺座谈会 何其芳
- 067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欧阳山尊
- 080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严文井
- 086 难忘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力群
- 090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与感想 萧军
- 097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王德芬
- 106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曲 韦嫫
- 116 平易近人的深刻教诲 姚时晓
- 121 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方纪
- 125 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回忆 蔡若虹
- 131 回忆那山花烂漫的五月 古元
- 135 漫忆延安 艾青
- 139 温故而知新 任桂林
- 147 回忆与断想 公木
- 155 忆六十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干学伟

161 忆式廓同志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吴 威

164 延安文艺座谈会见闻 温济泽

171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有关的人与事 黎 辛

## 史实与考辨

194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原因考辨 刘 忠

206 延安文艺座谈会议题形成过程考察 高浦棠

219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者人数再考察 高慧琳

223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版本与修改 金宏宇

## 232 我与延安文艺老人的一些接触（后记）

## 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

胡乔木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乔木”是笔名，江苏盐城人。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到达延安。曾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等职。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1945年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是中共第八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著有《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等。

### 座谈会前的延安文艺界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运动，包括各个部门和各级干部在内，文艺界和文艺工作者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文艺界的整风有文艺界的特殊内容。

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文艺界的整风运动由毛主席分管。

当时延安究竟有多少文化人？没有做过详细统计，1944年春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些文化人的绝大部分都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汇集到延安的。他们有的是受党组织



的派遣，更多的则是出于对延安的仰慕心情投奔光明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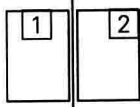
毛主席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深知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战线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所以自西北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抓文艺工作。同时，毛主席又是一位文学造诣很深的人，他的诗词和散文都具有很强的文学魅力，这又为他联系文化人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如中国文艺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学院、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民众剧团等，都是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大力支持下成立和开展工作的。许多知名的以至不甚知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都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每当毛主席看到一篇好的作品问世，都会表现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之情。1938年5月，他得知诗人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边区自卫军》受到群众的欢迎，便立即索要诗稿，亲自批道：“此稿甚好，赶快发表。”不久即连载于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面。1939年5月，他看了《黄河大合唱》的演出，据冼星海的描述：“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和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这些无疑都是对文艺家们的巨大鼓舞。

在延安文艺运动兴起之初，毛主席就多次发表讲话，阐明他的文艺观点。

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在保安县（今志丹县）成立时，他号召文艺家们“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sup>①</sup>。

1938年4月10日，毛主席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典礼上论述“艺术的作用和使命”。

他把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原苏区文化工作者称作“山顶上的人”，把由上海、北平等城市奔赴延安的文化工作者称作“亭子间的人”，说：“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他要求这两部分人都不要以过去的工作为满足，都“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sup>②</sup>他还特别讲道：“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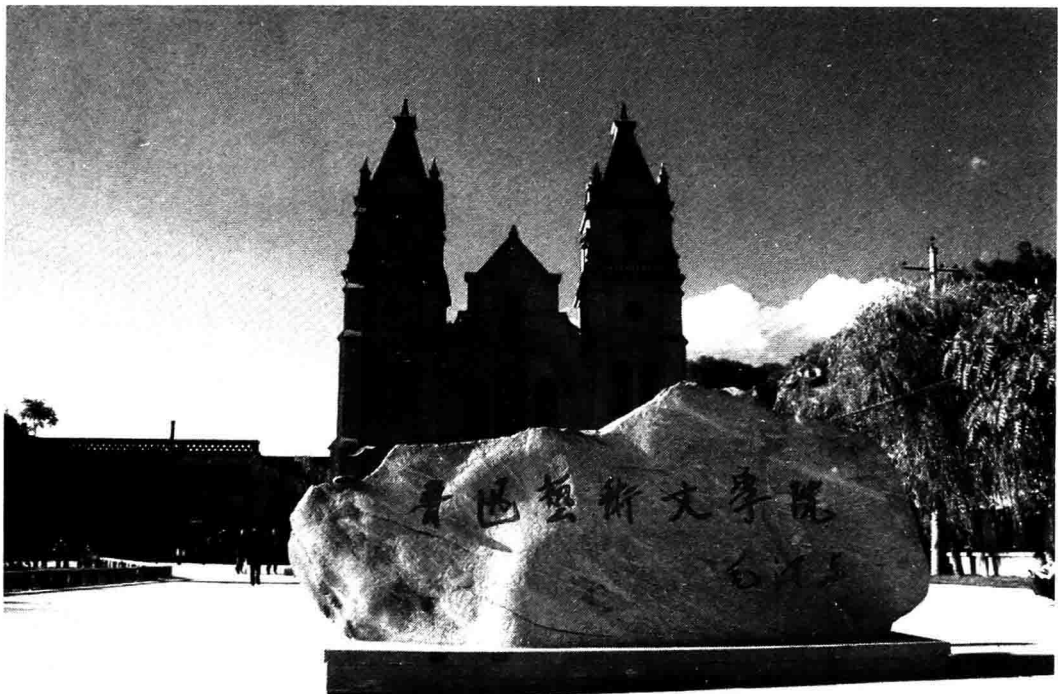


1. 青年们坐上卡车，即将离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奔赴延安
2. 《红色中华》报影

<sup>①</sup> 载 1936 年 11 月 30 日《红色中华·红中副刊》第 1 期。

<sup>②</sup>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载 1938 年 4 月 30 日《新中华报》第 432 期。





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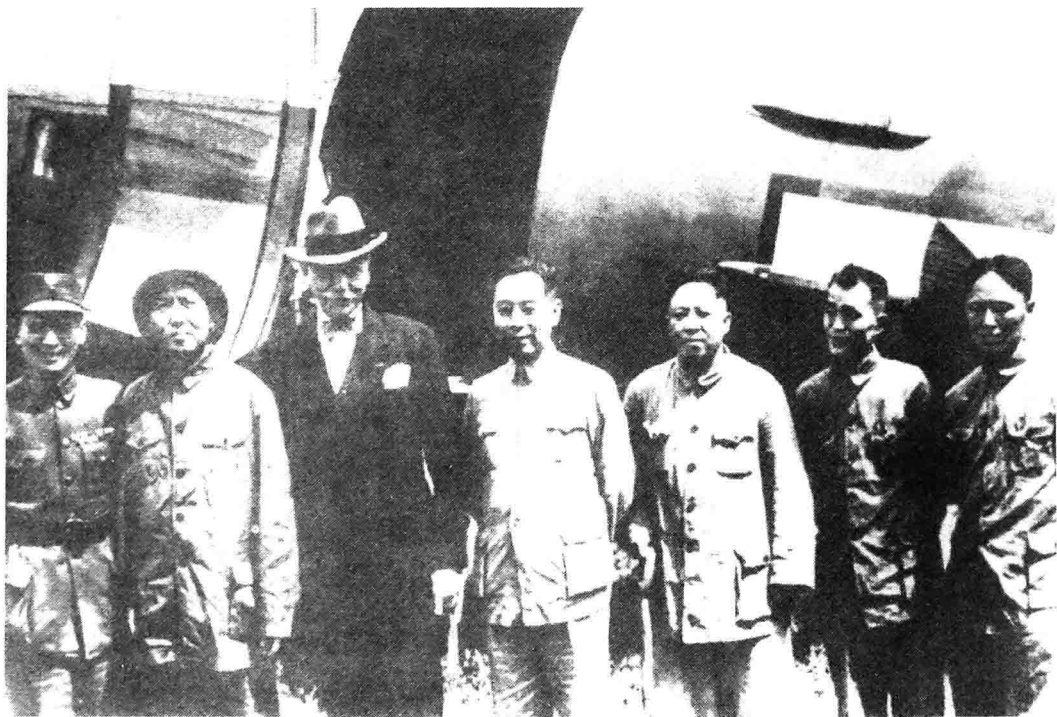
4月28日，毛主席再次到鲁艺发表演说，论述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他认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远大的理想”。“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第二，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艺术家的“大观园”是全中国，“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第三，要有“良好的艺术技巧”。技巧不好，“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1939年5月，他为鲁艺成立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

1940年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演，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说：“这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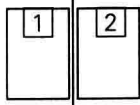
<sup>①</sup> 在鲁迅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记录稿。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把毛主席上述主张同他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作家应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这是他一贯坚持的文艺思想。

由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提倡，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热潮的推动与成百上千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获得蓬勃发展。正如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讲话中所说的：“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文艺运



1. 延安鲁艺旧址

2. 1945年8月，胡乔木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左起：张治中、毛泽东、赫尔利、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陈龙



1948年，胡乔木在西柏坡

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

但是，就当时涌进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尚没有真正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他们的思想感情还需要有一个改造的过程，对革命根据地的生活还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在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上，还需要有一个从口头承认

到彻底解决、从“化大众”到“大众化”的发展过程。就是说，大多数文艺工作者身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弱点。当抗日战争困难时期到来后，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他们之中一些人所具有的思想弱点，就更加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对于主要是1940年以后延安文艺界暴露出的问题，整风后期的一份文件中曾做了这样概括：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现在还是“杂

文时代”。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的方面纠纷也是层出不穷”。<sup>①</sup>这里的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其中列举的观点，有的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的，有的是作家们在同毛主席交谈时谈出来的，有的则是在文艺座谈会期间反映出来的。以下几方面问题尤为明显：

首先，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一个时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使用“讽刺笔法”、“还是杂文时代”等主张，几乎成为一种时髦。《解放日报》文艺专栏和一些文艺刊物上，也有宣传这类主张的文字发表。有人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

其次，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其办学方针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从1939年强调“正规”和“提高”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倾向发展起来。大戏、洋戏充满了舞台，而且影响到延安的整个演出界。讲写作，就是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小说。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教师却关在自己的窑洞里，不与农民往来。前方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艺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堡垒里的作家为什么躲在窑洞里连洞门都不愿意打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剧本、歌曲，但鲁艺提供出来的就是大、洋、古的东西。<sup>②</sup>这是很尖锐的批评意见。延安整风开始后，鲁艺领导人也主动检查了这方面的问题。

第三，是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这在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中也存在着模糊认识。作家欧阳山曾批评过“马列主义妨碍文艺创作”的观点。但也有作家主张不要把“什么‘教育意义’，‘合乎什么主义’的绳索”套在

---

<sup>①</sup>《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1943年4月22日党务广播），见《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49—450页。

<sup>②</sup>鲁艺戏剧部整风学习快报第三号，中央档案馆存。

文艺上面。

第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相当多的作家由于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又只在知识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甚至对知识分子的缺点也加以同情、辩护和鼓吹。反之，对工人农民则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像毛主席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文艺界没有真正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在文艺界发生的数不清的争论中，当然有些是有意义的，但也有许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甚至是彼此攻击，在一些细小的问题上挑起争端。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就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又被带到了延安，影响着文艺工作者的团结进步。

党中央和毛主席看到了上述种种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并没有构成延安文艺界的主流，但它们对抗战和革命事业是不利的，也阻碍着文艺本身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系统地制定党的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党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

## 座谈会的召开和《讲话》的正式发表

如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一样，为了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给许多作家写信，找了许多作家谈话，对有些人，信不止一封，谈话不止一次。他让作家们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等也分别找作家谈话。根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毛主席约去谈话的文艺家有丁玲、艾青、萧军、舒群、刘白羽、欧阳山、草明、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多人。

丁玲是抗战前夕第一个从大城市到达陕北苏区的名作家，西北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者、领导者，在文抗、文协中都有职务。她到陕北后，写过不少以人

民军队将领和群众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很受毛主席的器重。从1941年9月至1942年3月，她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她的《三八节有感》，曾受到贺龙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批评。毛主席同丁玲有过多次交往，座谈会前同她的谈话，主要是就文艺批评问题交换了意见。

艾青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鼓励和资助下，同罗烽等一起到延安的。不久，即先后受到张闻天同志、毛主席的接见，相继担任了文抗理事、《诗刊》主编、边区参议员等职务。文艺座谈会前，毛主席三次给他写信，两次约他面谈。交谈之中，毛主席对当时发表的某些文章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艾青恳切地要求毛主席亲自“开个会，出来讲讲话”，并把自己写的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送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不仅自己仔细阅读了艾青同志的书面意见，而且把它交给几位政治局委员传阅。毛主席尤其在“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上，对艾青谈了自己的看法，艾青也就根据当时对毛主席所谈看法的理解，修改了自己的书面意见，后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萧军1938年3月第一次到延安时，毛主席就曾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他。1940年6月第二次到延安后，担任文抗理事、《文艺月报》编辑、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从1941年8月至1942年5月，毛主席写给萧军的信共有10封之多。其中4封写于1941年8月，4封写于1942年4月，两封写于文艺座谈会期间和其后。萧军性格豪爽，有才华，但固执、孤傲，看问题有些片面和绝对化，尤其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因为不赞成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某些内容和《解放日报》没有刊登他们几个人同周扬商榷的文章，而负气要离开延安。他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对他做了开导，随后又于1941年8月2日写了第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坦率诚恳，既有批评，又有表扬，并指出了努力方向。信中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

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sup>①</sup>1942年4、5月的6封信，都同座谈会有关。毛主席还同萧军两次面谈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问题。

刘白羽当时担任文抗的支部书记。毛主席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要刘白羽找文抗的党员作家先行座谈，听取意见。在同毛主席交谈中，刘白羽提出“人犯了错误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回答说：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如果是写了文章，影响更大些，应该是在哪里发表的就在哪里改正。

欧阳山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草明是该室研究员。毛主席同他们谈话中，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问题才能解决。

同鲁艺教员们的谈话，是集体进行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作家与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与牢骚，“人性”与“人类之爱”，李白与杜甫，《聊斋志异》与今人作品等多方面问题。

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2日下午开始举行，地点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楼下会议室。请柬是以毛泽东、凯丰两人名义在座谈会前几天发出的，上面说明开会的目的是“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除毛主席、凯丰以外，当时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康生等也都出席了会议。被邀请参加会议的文艺工作者连同中央和一些部门负责人，共100余人。座谈会举行过3次全体会议，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主席自始至终地参加了这3次会议。

在5月2日的第一次会议上，首先由毛主席做“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这种风趣的说法，不但形象

<sup>①</sup>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生动，而且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一种崇高的评价。当然后来正式发表时，还是改成了更有概括性的语言：“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毛主席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立场、态度、工作对象、转变思想感情、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座谈会上，不少作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谈自己的见解，有的对其他人的发言提出不同意见。这次会后，报纸并没有做报道。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文章开头说“五月二日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举行过一次‘文艺座谈会’，作者为参加者之一”，这是第一次在出版物中报道了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消息。该文于6月12日由《新华日报》转载，又把这一信息传递到了国统区。

5月13日，延安戏剧界40余人集会，座谈剧运方向和戏剧界团结等问题。会议从早到晚，开了整整一天，中心是“文艺运动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两年来延安的“大戏热”是一种

1942年5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萧军《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





偏向，不适当地强调了提高，忽视了广大工农兵的需要，自觉不自觉地把观众对象局限于机关公务人员、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以后应更着重于普及工作。但普及与提高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大多数人认为普及和提高是同一工作的两方面，要有精确的分工，又要有有机的联系；另一些人认为应把两者分开，使它们各自专门化起来。这次会议既是对毛主席“引言”的响应，又为他十天后做结论提供了重要资料。

5月16日召开座谈会的第二次会议。整天时间，毛主席都在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有几个人的发言格外引起与会者的注意。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大家的不满。第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于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呼吁延安的文艺干部到前方去。从毛主席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发言很满意。柯仲平报告了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情况，说：不要瞧不起《小放牛》，我们就是演《小放牛》，群众很喜欢。老百姓慰劳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都吃不完，装满了衣袋、行囊和马褡。他的发言引起大家的欢笑，毛主席也很高兴，但他说：如果老是《小放牛》，以后就没有鸡蛋吃了。会上继续有人发表“人类之爱”和“爱是永恒的主题”“不歌功颂德”之类的言论。

5月23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气氛更加热烈。朱老总在下午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群众批准。不要怕谈“转变”思想和立场，不但会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他自己就是看到共产党能够救中国而由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